

摘要

学校编码: 10384
学号: 10220081152429

分类号__密级__
UDC__

廈門大學

硕士学位论文

魏晋五言诗兴盛原因新探

A New Exploration on the reasons for prosperity of
Five-character poem in Wei-jin period

周晶冰

指导教师姓名: 王玫 教授
专业名称: 中国古代文学
论文提交日期: 2011 年 4 月
论文答辩时间: 2011 年 6 月
学位授予日期: 2011 年 月

答辩委员会主席: 胡旭
评阅人: 陈庆元、张可礼

2010 年 6 月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均在文中以适当方式明确标明,并符合法律规范和《厦门大学研究生学术活动规范(试行)》。

另外,该学位论文为()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获得()课题(组)经费或实验室的资助,在()实验室完成。(请在以上括号内填写课题或课题组负责人或实验室名称,未有此项声明内容的,可以不作特别声明。)

声明人(签名): 周晶冰

2011年 6月 25日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人同意厦门大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等规定保留和使用此学位论文，并向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学位论文（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允许学位论文进入厦门大学图书馆及其数据库被查阅、借阅。本人同意厦门大学将学位论文加入全国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共建单位数据库进行检索，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方式合理复制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 () 1. 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查核定的保密学位论文，
于 年 月 日解密，解密后适用上述授权。
- () 2. 不保密，适用上述授权。

（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或填上相应内容。保密学位论文应是已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过的学位论文，未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的学位论文均为公开学位论文。此声明栏不填写的，默认为公开学位论文，均适用上述授权。）

声明人（签名）：周晶冰

2011年 6月 25日

摘要

魏晋时期五言诗之兴盛是中国诗歌发展中的重要一环,本文在对魏晋五言诗进行计量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对其时五言诗兴盛原因做重新探究。全文共分五个部分,具体构架如下:

导论部分以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为依据,对魏晋五言诗的创作情况做计量分析,概括介绍研究魏晋五言诗兴盛原因的价值和现状。

第一章探讨魏晋五言诗兴盛的外部原因。主要分析时代文化思潮和外在激励机制对魏晋五言诗兴盛的促进作用。

第二章探讨魏晋五言诗兴盛的内部原因。首先,从宏观角度看,魏晋五言诗兴盛符合文体因时更替的规律,其次,从微观角度分析五言诗的诗体优势。

第三章探讨文人选择对魏晋五言诗兴盛的促进作用,这是本文的“新”字所在。首先立足创作心理角度,分析诗人如何对待新兴诗体,其次从文人心态角度,分析魏晋时期文人的心理机制对五言诗发展的推动作用。

结语部分总结本文对魏晋五言诗兴盛原因重新探究之后得出的结论。

关键词: 魏晋时期; 五言诗; 兴盛原因

厦门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摘要库

Abstract

The prosperity of Five-character poem, which manifests in Wei-jin perio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oetry is an important link of wei and jin dynasty, this paper aims at the basis of wuyan poem, which manifests measurement statistics, combining previous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its thriving, reasons for that, hope to explore more far reaching conclusion. The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concrete structure is as follows:

Introduction based on The poetry of pre-qin to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which wrote by Mr Lu Qinli, analysis of Five-character poem, which manifests in wei-jin period.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value and research status of the reasons for prosperity of Five-character poem in Wei-jin period.

The first chapter discusses the external causes. Main analysis era culture trend and extrinsic motivation mechanism of five-character poem, which manifests the promoting function of prosperous.

The second chapter discusses the internal cause. First from macroscopic perspective of five-character poem, which accord with with style of the replacement of rules, then from microcosmic angle analysis the poetic advantage of five-character poem.

The third chapter discusses the choice of literati, this is the new exploration. Beg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sychology of creation, how treat emerging verse poet, Wei jin poet certain poetic face new initiative "battle" attitud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five-character poem. Seco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i mentality in wei-jin perio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ner world of literati of five-character poem, which manifests development role.

Epilogue part summarizes the paper explores again after prosperous reason of five-character poem, which manifests the conclusion.

Key words: Wei-jin period, five-character poem, prosperity reasons

目录

导论.....	1
第一章 外部原因.....	5
第一节 时代文化思潮.....	5
第二节 外在激励机制.....	11
第二章 内部原因.....	15
第一节 文体因时更替.....	15
第二节 五言诗体优势.....	16
第三章 文人选择.....	20
第一节 新兴诗体激发.....	20
第二节 心态变化推动.....	25
结语.....	37
参考文献.....	39
附录.....	42
后记.....	48

Catalogue

Introduction.....	1
Chapter One: External causes.....	5
1 The culture of The Times trend.....	5
2 Extrinsic incentive mechanism.....	11
Chapter Two: Internal reasons.....	15
1 Stylistic because when replacement.....	15
2 Certain poetic advantage.....	16
Chapter Three: Literati choice.....	20
1 Emerging verse arousal.....	20
2 Mentality change boost.....	25
Conclusion.....	37
References.....	39
Addendum.....	42
Postscript.....	48

导 论

五言诗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本文所论五言诗采用逯钦立先生所定之标准：“凡称五言诗，须通篇皆为五言，一也。凡称五言诗，不得含有兮字，二也。一体裁之成，须经长期之酝酿，今故不以某一人之有此作，定其原始”^[1] (P54)。此外，本文所论魏晋^①五言诗既包括徒诗五言，也包括乐府五言。

五言诗成熟于何时，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西汉说”，代表人为黄侃先生；一种是“汉末更后”的说法，代表人有梁启超、罗根泽、陆侃如、马茂元先生等。多数学者认同后者，但他们并未考证出具体的成熟时间，直到 21 世纪初，当代学者木斋先生通过一系列考证，得出五言诗成立于建安十六年之后的结论^[2] (P4)。很快，木斋先生的论证及结论得到傅璇琮、陈怡良、龚斌、宁稼雨等学者的肯定，但考虑到此结论有待学界进一步的论证考验，本文仍采纳五言诗成熟于“汉末更后”的说法，涉及具体诗作的写作年代则会综合参考木斋先生以及他人的论证，以期更加准确。

在五言体制成熟的基础上，魏晋五言诗出现兴盛局面。本文以逯钦立先生《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为依据，对魏晋各阶段（建安时期、正始时期、西晋时期、东晋时期）的五言诗作品数量、作家数量，以及各占总数的比例做计量分析，与两汉的诗作数量及同时期的四言诗、七言诗进行对比，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魏晋五言诗总数是汉代的近十倍，魏晋五言诗数占总诗数比例是汉代的近三倍，魏晋诗人总数是汉代的四倍，魏晋五言诗相对于前代的兴盛局面是毋庸置疑的。计量统计如下图：

《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诗人数	五言诗数	总诗数	五言诗数占总诗数比例
两汉	58	163	684	24%
魏晋	236	1541	2345	66%

其次，魏晋五言诗数及创作人数，占总诗数及诗人总数比例均在 65% 以上。

^① 学界有关魏晋时期历史文化等的研究，通常从东汉末年讲起。本文所论魏晋五言诗，亦离不开对汉末的相关研究，因此采纳学界惯例。所论“魏晋”既包括曹魏建立到东晋结束（公元 220-420），又包括汉末建安时期（公元 196-220）。

而四言诗和七言诗数及创作人数，加起来仍不及五言诗。因此，魏晋五言诗在作家作品数量上也是独占鳌头。具体到魏晋各时期的五言诗创作情况：从建安时期到东晋时期，五言诗数及创作人数分别增长了三倍和近六倍，这样的增长是四言诗和七言诗无法相比的。再看五言诗数及创作人数，占各时期总诗数及诗人总数的比例：建安时期和东晋时期都在 75%以上，正始时期和西晋时期在 50%左右。

魏晋五言诗在各时期数量和发展速度的水平都比较高，具体展现出魏晋五言诗的兴盛状态。计量统计如下图^①：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总诗数及诗人总数	五言诗数及创作人数	四言诗数及创作人数	七言诗数及创作人数	五言诗数及创作人数占各时期总诗数及诗人总数比例
建安时期	326 (19)	254 (17)	64 (11)	12 (4)	78% (89%)
正始时期	284 (19)	149 (12)	61 (11)	19 (2)	52% (63%)
西晋时期	789 (71)	374 (48)	260 (54)	29 (7)	47% (68%)
东晋时期	946 (127)	764 (98)	115 (46)	37 (5)	81% (77%)
总计	2345 (236)	1541 (175)	500 (122)	97 (18)	66% (74%)

此外，名家名作的出现也是魏晋五言诗兴盛的重要标志。汉末至魏最早出现的名作是古诗十九首，刘勰谓之“五言之冠冕”^{[3] (P66)}，钟嵘誉之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4] (P17)}。但有关古诗十九首的产生年代和作者一直存在争议，本文暂且不论。而有关魏晋时期五言诗的名家名作，齐梁时期的钟嵘有很好的总结，他认为建安、太康时期是五言诗发展史上的正宗，建安时期以曹植、刘桢、王粲为代表；太康时期以陆机、潘岳、张协为代表。钟嵘认为他们都是以文词名于世的诗人，他们的诗作是五言诗的冠冕，代表五言诗的最高成就。其中，曹植是大力创作五言诗的第一人，其五言诗 79 首，一人之作就占建安时期五言诗数的 31%，且艺术水平很高。此外，阮籍、陆机、陶渊明分别是正始、西晋、东晋时期创作五言诗最多的诗人，他们对魏晋五言诗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后人对魏晋五言诗兴盛状况也有明确认识。齐梁时代的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评价：“建安之初，五言腾踊”^{[4] (P66)}，同时代钟嵘的《诗品》专门从五

^①文中表格统计以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录诗歌为统计依据：即建安时期诗歌（魏诗卷一到魏诗卷八），正始时期诗歌（魏诗卷八到魏诗卷十二），西晋时期诗歌（晋诗卷一到晋诗卷十）东晋时期诗歌（晋诗卷十一到晋诗卷二十一），民间谣谚与乐府歌辞虽无署名，同样计入总数。

言诗的角度对诗人进行品评,清代的焦循主张“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文学论点,并且表示尝试“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5](P341)}。此类论述较多,兹不一一列举。

综上,五言诗在魏晋时代的兴盛是毋庸置疑的,但学术界对魏晋五言诗兴盛原因,尚未有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古代学者有涉及此问题的论述,但总体呈现零散、概括、感性化的特点,如齐梁时期钟嵘《诗品》:“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4](P2)};明代胡应麟《诗薮·内编》:“折繁简之衷,居文质之要,盖莫尚于五言”^{[6](P22)};清代刘熙载《艺概》:“五言上二字下三字足当四言两句,如‘终日不成章’之于‘终日七襄,不成报章’是也……是则五言乃四言之约”^{[7](P70-71)}等,这些论述只是零星地指出五言诗相对于其他诗体的特点和优点,未有详细论述。近代以来,一些著作对魏晋五言诗兴盛原因的做过相关探讨,但不够全面深入,如叶嘉莹先生《汉魏六朝诗讲录》侧重从诗体的演变、诗乐结合、节奏韵律方面研究“新创的五言体”;吴小平先生《中古五言诗研究》侧重关注五言诗赖以生成的音乐基础;钱志熙先生《魏晋诗歌艺术原论》侧重从社会的审美观念、音乐基础等方面立论;蒋长栋先生《中国韵文文体演变史研究》从语言学 and 美学方面做简单探讨等等。以上研究论著各有侧重,但都不够全面深入。论文方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五言诗的关注,集中在其发生发展的阶段、诗体特点、诗人群体(如“三曹”)或个体(如王粲、阮籍等)对其发展做出的贡献等,没有对魏晋五言诗兴盛原因进行系统论述。其中,刘毓庆先生有《五言诗兴盛原因之考察》^{[8](P13-16)}、王今晖有《建安时期“五言腾踊”成因初探》^{[9](P112-114)},对五言诗兴盛原因做了有益的发掘,但有些问题尚可作进一步探究。

魏晋五言诗兴盛原因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从中国诗体发展角度看,五言诗体上承四言诗体、下启七言诗体,是中国古典诗歌最基本的体裁之一。同时,它还影响词曲的生成和发展,是汉魏以来历代诗人使用最多、创作成就最高的诗体之一,在汉魏以来的历代诗坛、诗论,以及文人心目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从中国古典诗学角度看,前人对五言诗审美形式及审美标准的理论总结,丰富了古典诗学的理论范畴,比如“滋味”说等。通过对魏晋五言诗兴盛原因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认识古典诗学的相关理论范畴。从文学发展规律角度看,五言诗在魏晋时期的兴盛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反映出文学史发展乃是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统

一、发展与超越的统一、规律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鉴于魏晋五言诗兴盛原因的研究现状，本文拟从外部原因到内部原因、再到关键因素的逻辑顺序，对魏晋五言诗的兴盛原因进行重新探究。考察外部原因着重探讨时代文化思潮和外在激励机制的作用，内部原因则考虑文体规律和诗体优势的影响，以及文人选择的关键因素等等，对魏晋五言诗兴盛原因进行尽可能综合深入的探究。

厦门大学博硕士论文摘要库

第一章 外部原因

第一节 时代文化思潮

魏晋五言诗兴盛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无疑受到当时文化思潮的影响。魏晋是中国历史上继先秦之后的又一大变动时期，是一个“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时代，可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比，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认为，魏晋六朝时代是“社会秩序的大解体，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10](P177)}。大变动的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而这种有“文艺复兴”意味的大变动更重要地体现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思潮领域，“魏晋的文化思想，可以说是旧的破坏时代，同时又是一个新的建立时代。无论哲学文艺宗教人生观各方面，都脱离了旧时代的桎梏，活跃而又自由地发展着新的生命。这些新生命，都是后代文化思想的重要种子，在这个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有着文艺复兴的意味的”^{[11](P156)}。这“旧时代的桎梏”从学术上讲便是汉代的经学桎梏，经学本是一种注重名物考证和文字训诂的考据之学，但与政事结合后日渐僵化，以至于“率多不便属辞，守其章句，迟于通变，质于心用”^{[12](P11)}，形成执障、拘泥、繁琐的特点。魏晋思潮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破旧立新，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对此有这样的论说：“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的崩溃。烦琐、迂腐、荒唐，既无学术效用又无理论价值的讖纬和经术，在时代动乱和农民革命的冲击下，终于垮台。代之而兴的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是一种新的观念体系”^{[13](P85)}。

魏晋主要是世家大族统治的时代，不同于皇权至上、独尊儒术的汉代，政权变动带来的文化思潮变动巨大，汪文学先生有过系统总结：“汉晋文化思潮之变迁，呈现出由经验主义而自然主义的发展特点。具体地说，在士风方面，是从汉代的明经行修向魏晋的简易通脱方向发展；在学风上，由汉代的渊综广博向魏晋的清通简要方向发展；在文风上，由汉代的‘错彩镂金’向魏晋的‘清水芙蓉’方向发展。总之，汉晋文化思潮之变迁，大体呈现出避实就虚的特点”^{[12](P14)}。这些特点无疑是在“人的觉醒”的前提下呈现出来，人们的创造力被激发，破除旧的桎梏、推陈出新，文化氛围宽松、提倡创新和多元化，“文的自觉”顺势产

生。在此背景下，魏晋文化思潮呈现通达、适性、重情的特点，这对魏晋五言诗兴盛有着重要的外在影响。

汉魏两晋时期成熟的五言诗体与通达、适性、重情的魏晋文化思潮相合拍。成熟五言诗体的重要特点是音乐性与抒情性，而且这种带有自身韵律的抒情诗贴近生活、贴近心灵，为四言诗以及汉赋等其他文体无法相比，因此，人们对五言诗的创作热情很高，“普遍达到了‘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钟嵘《诗品序》）的地步，其作品多为个人情感之歌唱，并不追求政教作用”^{[14](P64)}。如果没有文化思潮推动，五言诗在魏晋能否兴盛则难以肯定，正如陶东风先生所说：“文本不管是作为语言结构方式、作家的个性表现还是读者的接受对象，都离不开它赖以存在的社会文化土壤，语言现象本身就是社会文化现象，语言结构（文体）的构建和阐释都是在文化背景中进行的”，所以“从社会文化的视角审视文体，将为文体的特征，文体的创造、阐释与接受，提供宏观研究框架”^{[15](P12)}。本文研究魏晋五言诗兴盛原因，社会文化思潮便是这个“宏观研究框架”，具体来说，这其中有三方面的作用比较重要：

一、诗歌消费的基础作用

从生产和消费的角度看，诗歌作为一种艺术产品，有属于自己的生产和消费途径，即拥有自己的创作和传播途径。魏晋时期诗歌艺术的生产和消费，在当时社会文化思潮中形成潮流，对其时五言诗的兴盛起到基础性作用，五言诗的兴盛即是在魏晋诗歌生产与消费的兴盛潮流中孕育出来。从整体来看，魏晋时期是个政局动荡、战乱频仍、生灵涂炭的乱世，文人失去安稳的政治环境，生存环境也充满危险，不能安心从事创作，这对诗歌艺术产生消极影响。但魏晋期间诗歌艺术的生产与消费从未中断，而且还出现兴盛时期，如建安时期、西晋太康时期和东晋中期^①。正如赵敏俐先生所说：“虽然‘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很快就将短暂的太平打得粉碎，歌诗的发展也随之跌入低谷，但这一时期（魏晋）歌诗艺术生产与消费的兴盛依然是值得一提的”^{[16](P287)}。

歌诗艺术生产与消费离不开社会经济提供的物质基础。魏晋时期虽然分裂动荡，但其间也有值得肯定的社会经济发展，如曹魏时期的经济复苏是对诗歌生产

^① 根据张可礼先生在《东晋文艺综合研究》中的划分，东晋中期指的是咸和中期到太元末年（公元396）约70年的历史阶段。

与消费的促进，是建安文学兴盛的物质基础：“曹魏及西晋前期经济的全面复苏，为歌诗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建安以来直至明帝年间，北方的农业经济始终在稳步发展，曹魏国力日益强盛。正是在此前提下，曹操于建安十五年（210）修建了铜雀台，这标志着诗歌产生必备的外部条件已完全具备”^[16]（P280-281）。西晋前期的经济恢复，为太康时期文学兴盛奠定物质基础。晋武帝多次下诏免租税、减刑罚、兴儒教，在恢复经济、教育等方面很是重视，泰始四年，司马炎下诏：“郡国守相……观风俗，协礼律，考度量，存问耆老，亲见百年。录囚徒，理冤枉，详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无有远近，便若朕亲临之。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17]（P57）。武帝类似的诏谕很多，直接促进西晋经济的发展，可惜，接踵而来的是“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对社会经济又一次大破坏。东晋建立后，门阀政治中的皇权与相权互相制衡，无为之治成为主导政策，清静无为的政治环境利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尤其是东晋中期，政权的内部矛盾较为缓和，与北方少数民族互不干扰，社会经济都较为稳定，在此基础上才有东晋中期文艺的繁荣，其中，诗歌的生产与消费也较为繁荣，兰亭诗便是这一时期的诗歌作品，对后世影响深远。可见物质基础对诗歌发展的重要作用。

二、上层社会的引领作用

在影响魏晋五言诗兴盛的社会文化思潮中，上层社会的引领作用也不可忽视。从魏晋五言诗兴盛的阶段及代表作家可以看出，其与魏晋诗歌兴盛的阶段及代表作家基本对应：一是建安时期，以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为代表；二是正始时期，以阮籍、嵇康等一批正始诗人为代表；三是西晋时期，以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等太康、元康诗人为代表；四是东晋时期，以郭璞、兰亭诗人、玄言诗人、陶渊明等为代表。这些代表诗人绝大部分属于上层社会，对政坛或文坛有影响，对社会文化思潮具有引领作用，而他们对五言诗创作的热衷必然会影响到整个魏晋五言诗的兴盛。

建安时期，上层社会对文学创作的引领作用最为显著。《文心雕龙》有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3]（P673）。曹氏父子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诗歌的创作中，曹操、曹丕和曹植共创五言诗 114 首，占到他们总诗数的 58%，他们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从

魏晋开始,统治者热衷参与、倡导文学创作,这种风气导致了一系列新兴文学形态的出现,如应制、应令、应教、奉和、奉答等诗的大量涌现”^{[18](P165-174)}。由统治者倡导的这类诗歌突出诗的交际功能,必然会对诗歌创作起到引领作用。曹魏统治者的文学爱好影响邺下文人集团的创作,如《初学记》引《魏文帝集》所云:“(文帝)为太子时,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命王粲、刘桢、阮、应等同作”^{[19](P890-163)}。他们有的应制赠答,有的同题共作。五言诗方面,王粲、刘桢、阮瑀、应瑒都创作有五言《公讌诗》、刘桢有《赠五官中郎将诗四首》、应瑒有《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曹植的五言赠答诗写得最多,分别有赠徐干、王粲、丁仪、丁翼、曹彪等,作于曹魏建国以后的组诗《赠白马王彪》最为著名,故钟嵘在《诗品序》中称赞“陈思赠弟”之作为“五言之警策”^{[4](P5)}。

同时,曹操对清商乐的爱好对五言诗兴盛也产生积极影响。“魏复先代古乐”^{[17](P534)}之后,由于诗与乐的密切联系,雅乐所对应的四言诗体并没有出现全面复兴,而由曹氏父子所开创的清商乐新兴起来,继而出现他们引领的“文人乐府诗运动”^{[20](P123)},五言诗体形制的新乐府诗随着清商乐的创制得到充分发展。相比古乐府以杂言居多,建安新乐府诗以五言居多,如王粲共有五首乐府诗(《从军行五首》)均为五言乐府,阮瑀共有两首乐府诗(《驾出北郭门行》、《琴歌》)亦均为五言乐府,这与曹氏父子的引领作用不无关系。根据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统计,三曹五言诗比例如下:

作者	总诗数	乐府诗数	五言诗数	乐府五言诗数	乐府五言诗数占乐府诗数比例
曹操	20	17	6	4	24%
曹丕	44	25	29	7	28%
曹植	134	67	79	35	52%

曹氏父子不仅是政权的掌控者,也是文坛的主导者,他们创作的五言乐府诗总数占他们乐府诗总数的42%,数量可观,是五言乐府的引领者。曹操的五言乐府诗有《薤露》、《蒿里行》、《苦寒行》、《却东西门行》;曹丕的五言乐府诗有《钓竿行》、《十五》、《猛虎行》、《善哉行》、《折杨柳行》、《饮马长城窟行》等;曹植的五言乐府诗有《薤露行》、《惟汉行》、《吁嗟篇》、《豫章行二首》、《浮萍篇》等。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门大学博硕士论文摘要库